

翻译中文化身份的再现与重塑探究

丁如伟

(山西农业大学 文理学院, 山西 太谷 030801)

[摘要] 译界迎来“文化转向”以来,翻译与身份问题进入研究者视野。跨语际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会再现或者重塑原文文化身份。研究表明,影响文化身份再现的主要因素有三:译者的文化态度、民族的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影响文化身份重塑主要因素亦有三: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本土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翻译策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举例阐述翻译中文化身份再现和重塑杂糅的现象以及其现实依据和意义。最后指出:翻译作品若能够平衡文化身份再现和重塑之间的关系,将不仅会使译文吸引大量异域读者,也会成功传递本土文化身份。

[关键词] 翻译;文化身份;再现与重塑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7) 04-113-06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译界不再拘泥于传统纯粹语言的翻译研究,开始迎来“文化转向”的热潮,与文化相关的各种因素逐渐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一旦涉及语际或跨文化交流,翻译文本就会呈现各种各样的身份。要做翻译研究,身份问题就不可忽视。约瑟夫(John E. Joseph)在《语言与身份》中提及:“在不考虑身份的情况下,不可能对语言有全面的理解。”^{[1]42}

社会文化中存在的身份多种多样,常见的有文化身份、语言身份、民族身份、社会身份、性别身份以及阶级身份等。在跨语际交流中,文化身份占据着重要地位。翻译的动态过程涉及对文化信息的处理,这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文化身份的确立。由于译者的主体能动性,译文会对原文的文化信息传达效果产生一定影响。韦努蒂(Venuti)认为翻译是“对文化身份的塑造”“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着对异域文化的再现”^[2]。翻译最终会对文化身份进行塑造:一方面,翻译会传达原文文化信息,再现原文文化身份;另一方面,翻译没能或者没有贴切地传达出

原文文化信息,从而造成翻译对文化身份产生重塑作用。

无论是文化身份再现抑或是文化身份重塑,都与一些因素密切相关,针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待拓展、深化。任秋红^[3]、张健^[4]、李兰^[5]、周玲玲^[6]等人的研究均谈及“文化身份”,内容则重在阐释文化与翻译的关系;华汀汀^[7]、王月^[8]等人的研究也涉及翻译与文化身份,但是内涵还需进一步挖掘。迄今,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唯一一篇论及翻译与文化身份塑造的论文为刘艳芳的《文化翻译与文化身份塑造》^[9],她将文化翻译对文化身份塑造的影响在理论上进行了阐述,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涵盖面还需拓宽,以便于全面把握实际。总之,针对文化身份塑造的因素和效果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如此将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翻译方向,更好地建构本土文化身份。

二、文化身份的重现

文化身份的重现具体说来即是凸显文化的异国情调。法国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在他的著作《异国情调论》把异国情调定义为:“不是别的,就是差异的观念,是对不同事物的感

觉,是感知到某种东西不是自己。”^{[10]145}在此所谓的“自己”,指的便是“身份”。在翻译层面,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在论及文化翻译的问题时极力主张异化翻译策略,以尽量呈现给读者原文的“异国情调”。原文的“异国情调”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差异。表现原文的“异国情调”,就是要凸显文化差异,重现与本土文化不一样的身份。国内的一些翻译家曾主张文化身份通过翻译得以重现。“五四”后的十五六年间,在鲁迅、瞿秋白等人“尽量保持洋气”的倡导下,不少作家、翻译家有意识地采取异化译法,展现给读者的是富有西方文化特点的译文,进而再现西方的文化身份。为了传达国外作品的异质成分,不少人会将异化译法作为首选。但有人会走极端,一味地使用异化翻译,导致译文晦涩难懂,给目的语读者带来诸多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影响文化身份的重现。有的翻译家则通过在异化和归化之间寻求平衡,使得翻译作品在保证可读性的同时,亦较好地呈现出原文的文化身份。原语言文化身份的重现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其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三方面。

1. 译者的文化态度。对于将外来语言译为本族语言的译者而言,他/她的文化态度对文化身份的重现至关重要。一个民族的文化地位既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也是一种主观的认定^{[11]4}。译者文化态度也就是指原语文化在译者心理上的主观认定。译者对原语言文化主观上表示认可和接受时,会更深层次地去理解外来文化思想和文化传统,在翻译过程中也会力求传达原语言文化的信息,更多关注原语言文化进一步传播。这样更利于再现原语的文化身份,也是译者主体性的一种表现。

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12]过程中,对小说承载的文化有着一种积极对待和接受的态度,从他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异质文化的表现可窥见一斑。葛浩文不似一些译者那样,出于各种原因,把对目标语读者读起来拗口的异域地名和地理标识替换成他们所熟知的符号。相反,译者在译本首页,附以一张中国地图,并特别标注了这本小说所发生的地点和重要的地理位置。通过此番处理,译本展现给读者更多的是远离自己生活环境的一个“他者”,仿佛带着读者在异国他乡

旅行,出于对读者迷失方向的担忧,特别为他们提供旅行的地图。这在某一程度上保留住了原文所具有的文化风貌,再现了原文的文化身份。由此可见,译者对待文化的主观态度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文本翻译效果。

2. 民族的文化地位。翻译是不同语言群体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事实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素来鲜有平等。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处在强势地位,译者对待外来文化不免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翻译过程随心所欲,导致“他者”文化面目全非;如果民族文化处于弱势地位,译者对待外来文化的翻译处理,更多地会亦步亦趋,力争做到不舍分毫。埃文-佐哈尔(Evan-Zohar)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或起主要作用,或起次要作用^{[11]4}。也就是说,民族文化的发展状况决定文化翻译在多元文化系统中是处在中心还是边缘的位置。

翻译对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反作用。根茨勒(Gentzler)说过,“民族的生死存亡都得依仗于翻译”^{[13]106}。例如,海伦(Heylen)对Hamlet的六个法译本所进行的研究形象地表明了文化地位的改变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当法语文化从历史上的统治地位走向衰落时,其翻译策略也从归化走向了异化^{[14]368},从开始的再现原文文化身份到后来的重塑文化身份。

若是翻译真实再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那么就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延续和发展,这也意味着民族的延续和发展。同时,语言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宗教、风俗、思维范式、行为逻辑等,文化的交流更多地体现在语言的交流,文化身份的再现就需要在语言层次上的再现得以实现。比如葛浩文的《狼图腾》译本对“风水宝地”^[15]一词的翻译,将其译为“treasure land with its perfect feng shui”^[12],并不仅仅表达出其含义“treasure land”,而且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风水(feng shui)”给传达出来,这样更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让外国读者接受中国文化。

3. 翻译策略。译者的文化态度和民族的文化地位同时决定翻译策略的选择。当翻译文化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往往会运用本国或者本民族文化中国固有的思维和模式进行翻译创作,在译文

中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迎合读者的审美倾向。其结果是译本在读者群体中可接受性较好，但会影响原本文的文化身份再现。

当翻译文化在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多数读者也会熟知该文化。译者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原语的文化身份再现给读者。韦努蒂在德国译论家施莱尔马赫的“归化”(naturalizing)和“异化”(alienating)的基础上又发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抵抗式(resistant)翻译观。抵抗式翻译观是异化在权力中心和意识形态等文化层面的进一步延伸，旨在使读者处处都能感受到原文中的异国情调。这一策略的应用会使译者在译文中留下自己的痕迹，译者也就不再处于隐身状态。

译者在心理上对待文化的主观态度最终决定翻译策略的选择。在《狼图腾》的翻译过程中，葛浩文为了保留小说中蒙古族的“原汁原味”，对于小说中出现的用汉语表达的蒙古词汇，例如“哈拉盖(halagai)”“阿嫫(Aniang - Mother)”“霍勒黑(可怜啊)(Huolehei)”，不惜通过多种途径查找蒙语的发音，力图将其蒙古味道给传递出来。该译文明显带有译者精雕细琢的痕迹，给目标语读者的视觉和心理感受便是“一顿‘异域文化’的宴飨”，成功再现了蒙语的文化身份，同时也促使读者有意识地走进“他者”文化，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三、文化身份的重塑

勒菲维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也是一种文化操纵^[16]。对原文文化改写和操纵的结果是重塑了异域文化身份。翻译如雕塑一般，雕塑家每完成一件作品，便达到自身在作品上的自我延伸。雕塑本身具备一种身份，代表一种象征，传达一种意义。若是另一位雕塑家在一件他人之作上补刀、打磨、上红，那么该作品必然会承载后者加工的痕迹，原作品的身份、象征和意义多多少少都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同理，译者是改写和操纵的实施者，对翻译效果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判断和选择与其本土文化的熏陶和渲染密不可分。对于异域文化身份的重塑，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探讨其影响因素。

1. 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译者在选择文本翻译时，势必受到其自身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其文化价值取向决定他/她文本选择的偏好及取舍，这种选择已然树立了异域文化一定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形象。韦努蒂通过研究现代日本小说的翻译，指出二战后的美国出版商确立了日本小说的英译“典律”，这一典律不仅没有代表性，而且建立在固定的文化身份之上^{[2]359}。由于西方向来标榜其文化中心主义，译者价值观很难不受其影响。在翻译东方文化文本时，多数译者不免落入英译“典律”的窠臼，选择刻板的“东方形象”，以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否则读者群难以形成规模。

《狼图腾》葛浩文英译本也集中体现了译者自身的价值取向。应企鹅出版社的要求，也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译者删除了小说中的议论，还故意隐去小说背后约5万字的总结。与此同时，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理解，译者在译文中增添了大量注解内容，使波澜起伏的故事愈加扣人心弦，小说化和故事化特点得以进一步显化。英国《卫报》评论道：《狼图腾》英文翻译的水平之高，使作品流畅生动，是大师和指挥的完美合作^[17]。译文不仅符合西方读者的英语表达习惯，更重要的是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由此可见，译者的文化偏好影响了异域文化身份，以强大的力量完成对异域文化身份的重塑。

2. 本土主流意识形态。翻译活动是在目的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中重新建构一个承载原语文本意识形态内容的载体建筑——译本^[18]。而要完成这个载体建筑所需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方式，如词汇、概念、语法、文体等等，无不来自本土。如此一来，翻译必然受到本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之下，译者对不符合本土主流意识的原文概念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改写，这等同于为本土读者重塑了另一文化身份，进而必然影响到原文文化身份的再现。

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本土意识的影响。例如，对“日本鬼子”的翻译，将其简单地翻译成“Japanese soldier^[15]”，这完全是站在西方民众对待日本的立场进行翻译，全然无视原文本身含有的情感色

彩。译文中诸如此类的例子随处可见,似此这般的翻译无疑重构了另一文化身份。由此不难看出,译者很难挣脱自己本土的主流意识形态“干净”地站在“他者”的立场进行翻译。

3. 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基于一定的目的选择直译还是意译,异化抑或是归化,而并不一定追求译文和原文完全对等。译者翻译策略的选取会受到本土意识形态、个人价值体系、政治要求等因素的影响。居于强势文化的译者在翻译弱势文化时,采取只求达到一般交际目的而不刻意努力去传达弱势文化的一种比较随意的翻译方法,有时甚至出现故意篡改弱势文化的现象^{[19][28]}。

提莫志克和根茨勒合著的《翻译与权力》一书中有这样一例:在译者威廉·亨利(Henry William)的操纵下,采用一些翻译策略,如改写、增删、模糊处理关键词,甚至伪造,重新塑造一个亲近毛利人的英国文化身份,最终使得毛利人接受这份备受争议的条约^[20]。犹如一个面目狰狞的恶人,通过一些方法和手段将自己乔装打扮,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重新塑造另外一个身份,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而以一副和善者的面孔示人。

四、翻译中文化身份再现与重塑的杂糅

害怕未知事物是人类的本性,是人体机能的本能反应,遗传自我们的祖先。精神病科医生弗雷德里克·沙佩勒(Frédéric Chapelle)曾如此解释:“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离开居住的洞穴是很危险的:离开后,他们不一定能找到食物,而且遭遇凶猛动物的几率也更大。”^[21]这种心理在电影《疯狂原始人》中诠释得很到位。由于本性使然,人类潜意识下总会对陌生人或物产生排斥、怀疑甚至毁灭的心理。每当一种新生事物出现时,总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有时会声势浩大、诚惶诚恐。针对跨文化交流的作品翻译活动,人类的这种心理也概莫能外。翻译文本所承载的文化,如若以一种全然异于目标语读者的面目示人,多半会由于经济效益、文化接受度等因素而被扼杀在出版商或赞助者等人之手。毋庸置疑

疑的一点是:译者无论是在文本抉择抑或文本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对此类问题有所考量。这就是为什么读者接触到的多数翻译作品,既有原文异域文化的身影,又有自己熟知的本土文化的气息。

以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为例,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单单是靠作家莫言一己之力吗?细想之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团中知晓中文的寥寥无几,更不用说透彻理解作品中狂欢颠覆、混沌浩瀚、绚丽斑驳的语言。许钧教授认为他们评选的依据是莫言作品的译本,“没有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不可能进入诺奖评审的视野,译者当然功不可没”^[22]。基于上文葛译《狼图腾》的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以下论断:不能简单地将译本定性为是对原文文化身份的再现抑或是重塑,只能说是二者杂糅交织的产物。因此,译本不但在西方广受欢迎,莫言的写作也受到好评,最后成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一针强有力的兴奋剂。

文化身份再现与重塑的效果受到译者翻译策略的制约。一方面,单纯地使用异化会因译者囿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阐述和表达,让读者不知所云,最终使得译文接受效果不甚理想;另一方面,过度使用归化策略,则会全然抹杀异质文化,不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适当地采取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策略,会更好地达到再现文化身份的效果。

中国典籍英译中不乏此类实例。辜鸿铭在翻译《中庸》^[23]时,没有纯粹地使用异化翻译策略,而是在归化和异化之间获得一种动态平衡。

原文: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辜译: He is a vulgar person who is his heart has no regard for, or fear of, the moral law. 注释: The fool hath said in his heart. There is no God. ^[23] (《圣经·诗篇》)

他通过此番处理,使得西方读者在自己概念框架下理解中国文化。他国读者读中国的《中庸》就仿若读他们熟知的《圣经》一般,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原文的文化身份。然而重塑的身份恰是辜译本能够在西方风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辜鸿铭也并没有单纯地为吸引西方读者而一味采取归化翻译,下列几例对核心概念的翻译便

是明证：

性：moral nature 或 our moral being

道：the moral law

君子：moral man

和：moral order

仁：moral sense

“moral”一词的使用在译文核心概念中随处可见，一以贯之，时时凸显儒家思想的道德主题。如此翻译引起的效果是在西方世界撒播下中国话语，中国传统的文化身份也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辜鸿铭翻译《中庸》，通过重塑目标语读者所熟知的身份博得了他们的青睐，又通过再现文化身份让目标语读者领略了异域文化，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二者的杂糅使文化传播更远，效果更佳。

如何创作广受读者欢迎而又文化蕴涵丰富的译品，是每一位译者应当认真思考对待的问题。翻译中应当注意平衡各种翻译策略的动态选择，实现文化身份再现和重塑的较好杂糅，这是做好翻译的重要着力点。

五、结 语

文化身份的确认已经成为当今第三世界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民族文化只有通过文化身份的确认，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他者”文化相区别的文化身份的认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翻译的过程，也是文化身份塑造的过程。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影响文化身份塑造的五个重要因素：译者文化态度、译者文化价值取向、民族文化地位、本土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译者翻译策略选择。这五个方面看似相互独立，实则密切相关。

萨义德认为，不分东西方，不论哪个国家，自我身份的建构都离不开“他者”的参与^[24]。之所以离不开“他者”参与身份的建构，是因为不论何种身份，都摆脱不了异质文化的影响。文化身份的有效建构，应该维持认同他者与认同自我之间的必要张力：既吸收他者的诸多合理的文化身份属性，又发扬自我的诸多有益的传统文优势。

正处于文化转向的今天，我们要把握好文化

身份的再现和重塑这一重要课题。中国大力发展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要求我们更应该在这方面做出努力，正确理解文化身份的概念，熟知文化身份塑造的因素，平衡文化身份再现和重塑之间的关系，才能在翻译实践中正确地发挥作用，更好地维护民族文化精髓，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 [1] JOSEPH, JOHN E. Language and identity: national, ethnic, religious [M].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2] 韦努蒂, 著. 查正贤, 译. 刘健芝, 校. 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 [M] // 袁伟, 许宝强.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359-368.
- [3] 任秋红. 论译者文化身份对其翻译的影响 [D]. 郑州: 郑州大学, 2005.
- [4] 张健. 译者文化身份和诗歌翻译中的阐释学 [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09.
- [5] 李兰. 文化身份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导向作用 [D]. 长沙: 中南大学, 2009.
- [6] 周玲玲. 从动态文化身份看葛浩文的翻译观 [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4.
- [7] 华汀汀. 文化身份与翻译 [J].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2003 (5): 91-92.
- [8] 王月. 翻译与文化身份关系研究 [D]. 成都: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6.
- [9] 刘艳芳. 文化翻译与文化身份塑造 [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3): 107-109.
- [10] 张隆溪. 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145.
- [11] 王东风.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 [J]. 中国翻译, 2000 (4): 2-8.
- [12] 姜戎. 狼图腾英文版 [M]. 葛浩文, 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8.
- [13]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06.
- [14] 刘彬.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12 (2): 367-369.
- [15] 姜戎. 狼图腾 [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 [16]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17] 木叶, 谢秋. 《狼图腾》行销110个国家, 中国书正在走出国门 [EB/OL]. (2008-04-02) [2016-10-31].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4/01/content_2125921.htm.
- [18] 汤君. 翻译语境中的意识形态研究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8 (4): 74-75.
- [19] 张景华. 全球化语境下的译者文化身份与汉英翻译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 (4): 126-129; 147.
- [20] TYMOCZKO MARIA, GENTZLER EDWIN. Translation and powe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 [21] 我不爱出远门 [EB/OL]. (2013-12-24) [2016-10-30].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2/24/32408686_0.shtml.
- [22] 许方, 许钧. 翻译与创作——许钧教授谈莫言获奖及其作品的翻译 [J]. 小说评论, 2013 (2): 4-5.
- [23] 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M]. Shanghai: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td, 1898.
- [24] E SAID. After the last sky [M]. New York: Pantheon, 1986: 16-17.

A Study of Repres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ranslation

DING Ru-wei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0308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Turn”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the issue of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comes into researchers’ sight. Cultural ident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lingu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exertion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ill represent or reconstruct cultural ident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several examples. It summarizes thre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epresentation of foreign cultural identity: the translator’s cultural attitude, the nation’s cultural position/statu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y. There are three main factors that impact the narration of foreign cultural identity as well, including the orientation of translator’s cultural value, the nativ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strategy. The paper further expounds, with several examples, the phenomenon of hybridity of cultural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ranslation and its realistic basis and significance. It can be safely concluded that if the balance of repres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can be achieved in the translated works, the translation will not only attract more foreign readers, but also convey the native cultural identity to them.

Key words: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陈蒙腰)